

# 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 时代彰显与实践引领<sup>[\*]</sup>

韩 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生存正处于从资本扩张的单向支配到普遍交往的互动共建转型之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内, 奠基于人的类本质存在的类价值生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全球化生存的类主体内在地蕴涵着一种积极的他者意识, 由此而拥有了一种正确认识、分析和推进人类社会整体进程的更加广阔、开放、包容的生存视域。在世界历史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主体的成长发展体现为交往意识深化所带来的开放精神的增强、平等精神的彰显和自由精神的成熟完善。在全球普遍交往的共同生存语境中, 唯有一种基于平等承认的视域融合才能生成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充盈张力的类价值标准。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球化生存的现实, 理顺了全球化演进的机制, 廓清了全球化发展的路径, 是全球化和谐共生在生存实践的重要价值引领。

[关键词] 世界历史; 全球化生存; 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3. 11. 001

在世界历史尤其是全球普遍交往趋势加强的时代背景下, 全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攸关、共生共在的命运共同体, 深化交流互鉴、共担风险挑战、共享发展成果是全球化时代类价值的基本内涵。全球化生存是人类在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必然要经历的存在状态, 理解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生存状态需要在明确人的类存在本质基础上确立类价值自觉。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人是类存在物, 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 而且因

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sup>[1]</sup> 脱胎并超拔于自然界的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自由存在物, 正在于人类能够在彼此之间实现相互建构和确证并由此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成了人的本质属性, 交往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类主体的生成由此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全球普遍交往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类主体蕴涵着对全球一体化生存的清醒认知和理

作者简介: 韩升, 哲学博士,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1BKS115) 的阶段性成果。

性判断,在对全人类“能否共同生存”“以何共同生存”“如何共同生存”的审慎回答中生成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类价值自觉。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sup>[2]</sup>在全球和谐共生已成世界历史发展明确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基于“现实的个人”对类存在本质的积极追求,蕴涵着“现实的个人”存在于世的自由向度,体现了当今时代全球化生存迈向更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的类价值自觉,是当今时代类价值的最重要呈现形态。全面理解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深刻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化生存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百年变局中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展开、当今世界历史的文明演进和人类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推动类价值的客观生成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历史唯物主义昭示的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解放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期就科学预言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并将之与“现实的个人”的解放程度紧密结合起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sup>[3]</sup>因此,世界历史演进发展的进程与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说,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个人都是世界历史宏大进程的在场者,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推动者,都是世界历史恢宏篇章的书写者。

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孕育催生一种与之相契合的类主体。从交往相对有限、视野相对局限的传统熟人社会迈向交往日趋普遍、视野日趋开

阔的现代陌生人社会,意味着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在更广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达成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是将单个人的解放程度与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紧密关联起来。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sup>[4]</sup>当今时代,尽管依然存在逆全球化的虚妄之举和反全球化的痴心妄想,但经济领域内的深度融合、政治领域内的多边合作、文化领域内的对话交流、社会领域内的频繁往来、生态领域内的和谐共生已经将类主体推向了时代发展的前沿:每一个“现实的个人”在多大意义上成为全球化叙事的类主体,决定了其能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演绎的真正主角。就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来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信息等各种事务跨国界流动的日益增多、增强,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已突破国家,走向全球。仅仅局限于国界之内,以国家为主体思考和管理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已远不足于满足现实的需要,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的全球化或与日俱增的全球性,要求审视和确立新的主体,这个新主体就是作为类主体凸显出来的人类。”<sup>[5]</sup>由此来看,世界历史演进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必然会催生和造就与之相契合的类主体,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社会中的混沌性自我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子化自我有本质区别的真正主体意义上的自我,在这里所有的等级制的封闭禁锢、资本逻辑的抽象强制、后现代主义的支离破碎都将被替代和超越。类主体是世界历史背景下普遍交往深度发展的重要产物,是全球化生存语境中主体意识更趋成熟与完善的必然结果。

与世界历史发展相契合的类主体内在蕴涵了一种积极的他者意识。类主体伴随着普遍交往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而生成,意味着超越了狭隘、封闭、隔绝、孤立的原子化视角来看待发生对话交往关系的“有意义的他者”。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现实的个人”自我本质构成意义上的社会性,将社会交往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

力。这一重要识见蕴涵的基本原理在现代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查尔斯·泰勒指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sup>[6]</sup>也就是说,作为人之本质属性的社会性,意味着自我构成、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与“有意义的他者”进行对话、交流、互动、交往的过程。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自我必然是开放的、包容的,只有这样自我才能是成长的、发展的。类主体的生成内在地包含了对“他者”意义与价值的充分重视和积极肯定:“他者”不再是疏离甚至是对立的客体而是自我在更趋开放语境中实现完善与发展的构成性条件,“他者”带来的不是“地狱”,也不是自我被“抛入”其中的虚无之境,而是与自我共同扎根其中的“诗意栖居”状态。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自我”与“他者”趋向更加和谐完满的交流互动、相互承认、彼此证成、协同共进、共在共荣的过程,是人在普遍交往的类存在意义上获得更大自由与解放的过程。

结合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来看,尽管全球化生存的“诗意栖居”依然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但不可否认的是,类主体及其伴生的“积极的他者”意识必然会带来一种更加广阔、开放、包容的生存视域来正确地认识、分析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习近平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sup>[7]</sup>在这样一层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历史语境下类主体成长与发展之客观趋势的积极呈现和准确表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人类整体命运与未来的世界历史性行动,体现了全球化生存中追求和实现类价值的高度自

觉。“人对类价值的追求、创造和实现,是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是社会历史发展最深层的本质和最为根本的动力。因此,高扬人的价值,必须具有宏大、深远的社会视野和历史深度。只有将人的价值的核心定位于为了类的存在和发展,将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定位于人的类价值的不断实现,才会有人类社会历史的持久发展,才会有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sup>[8]</sup>全球化生存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已经介入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之中,全球化生存作为一种更加积极合理的类生活价值目标依然需要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更加充分地认同和更加自觉地实践。

不可忽视的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依然无视世界历史发展带来的与全球化整体生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资本逻辑及其外显的殖民心态作祟、权力意志膨胀依然在扰动和破坏人类建设共有美好家园的协同行动。弗朗西斯·福山在20世纪末依然固执地将世界历史的演绎和书写交到了少数所谓“民主”国家的手中:“一部人类世界普遍史与一部世界通史不可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类事件‘流水账’式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尝试,试图想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现一种有意义的模式。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这项工作本身就不是所有人和所有文化都必须进行的。”<sup>[9]</sup>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文明进步的历程绝非芸芸众生合力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是少数天才头脑、优良种族、“民主”国家的理性规划和完美设计而已——无怪乎他会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后》第五章“世界普遍史的思想”的开端引用尼采《历史的运用及滥用》中关于“世界进程的金字塔尖”“知识的最后里程碑”“大自然的最后杰作”等话语来证明其别有用心。历史终结论调,实质不过是掩盖西方少数所谓“民主”发达国家骄纵张狂的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外衣而已,世界历史发展的浪潮绝不会因此逆流而出现根本性转向,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取向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



## 二、交往意识的深化激励类价值主体的精神成长

在世界历史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交往意识的深化意味着在价值认知上对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承认、彼此证成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就是类价值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这对于抑制暴力冲突和强权霸凌、推动和谐互动和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如果说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把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置于中心地位,那么,现当代哲学家们所强调的从抽象‘主体’的‘立法’向‘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的范式转换,旨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联合’,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并把减少和制止各种形式的暴力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破坏作为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价值核心。”<sup>[10]</sup>全球化生存的世界历史开放语境,不仅是指外部物理空间中交往行为的普遍加强,更是指每一个身处其中的“现实的个人”内在心理空间中相互接纳的深度发生。从这样一层意义上看,交往意识的深化是主体性精神成长成熟的重要表现,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必然蕴涵着全球化生存进程中类价值主体的普遍觉醒:既有对类存在现实的清醒认知,又有对类存在价值的理性设定。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将交往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于交往的发展和交往意识的深化蕴含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追求。

交往意识的深化体现为一种开放精神的增强,这是类价值主体成长发展的前提。开放,意味着勇于破除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封闭性禁锢而积极向外部敞开自身,意味着在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超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就是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其中蕴涵着人类开放意识的自觉养成和开放精神的深化拓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洞见了资本逻辑扩张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和各民族摆脱狭隘的地域性生存状态,从而为人类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未来理想的共产主

义社会创造条件。当然,马克思也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开放及其推动的全球化具有内在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单向的、支配性的、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全球化,由此而来的开放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并非真正自觉自主意义上的开放。伴随着旧殖民体系崩溃而来的开放精神以高度容涵性将命运与共的时代主题内在贯穿和渗透于全球化生存的发展进程之中,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sup>[11]</sup>向世界敞开自身,热切拥抱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一切,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生存的积极姿态。经济资源的配置、物理边界的跨越、人口流动的加速、思想分歧的弥合与开放精神的增强将一起汇聚成全球化生存的强大力量,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

交往意识的深化体现为一种平等精神的彰显,这是类价值主体成长发展的内核。在人际交往相对有限的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平等并非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诉求。伴随着社会交往普遍化程度的加深,平等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所有的制度设计与社会规范都将平等作为重要的价值纳入其中。可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越来越平等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平等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弥散和扩展的过程。当今时代全球化生存内蕴的平等精神意味着在所有的国家、地区、民族和“现实的个人”之间形成一种真正的交互主体性,即每一种在特定文化传统中自然生成的存在样态都应该得到尊重、承认和接纳,都应该获得自身合理性的呈现和确证。平等,不是消除差异的整齐划一状态而是有机互补、共生共在,不是有意遮蔽甚至强行压制而是交相辉映、同频共振。全

全球化生存不是单一生存方式的简单移植和机械复制,而是不同存在样态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协奏”与“共鸣”。基于此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将平等精神铭刻和渗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习近平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sup>[12]</sup>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在自我确证和自我呈现中彰显他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尊重他者合理性前提下维护自我利益和追求自我实现,这样才能真正建构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交往意识的深化体现为一种自由精神的成熟完善,这是类价值主体成长发展的旨向。主体不是遮蔽他者的原子化自我,而是在现实的交往中不断成长发展的“定在的自由”。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论及原子、虚空与作为“定在”的现实的关系时指出:“原子既被假定为抽象的、个别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就不能够显示自己为具有理想和统摄作用的那种多样性的力量。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不是即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够为定在之光所照明。”<sup>[13]</sup>主体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虚空中原子的抽象性,展现了对充满诸多关系的现实世界的充分认可。自由精神绝非虚无主义的无所依凭,而是在社会交往建构的意义之网中实现一种确定性的积极生活。追求自由是主体成长发展的重要表现,但自由不是自我的野蛮生长和肆意扩张,更非对他者的忽视、无视甚至干涉、践踏。全球化语境中人类自由精神的成熟完善蕴涵着一种交互性的生存智慧和行动伦理,这意味着强调权衡协调的实践理性(即“爱的智慧”)取代了注重单向构思的知识理性(即“爱智慧”)而成为处身于世的标准和信条。“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相

互联系的全球秩序中,它被多种全球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分化和团结的复杂模式所整合,这些行动者日益意识到他们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命运。”<sup>[14]</sup>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全球化生存理应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行动自由,这绝非一种遮蔽了他者的行为任性,更非一种盲目随意的四处冲撞,当然也并非一种尽善尽美、毫无缺陷的理性设计,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生存处境中灵活措置,积极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自我与内在精神的动态平衡关系。真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释放了人类创造美好世界的无限想象力,人类在整体意义上构思理想生活、摹画意义图景、追求美好未来的实践活动展现出了更高层面上的自由精神。

可以说,交往意识的深化意味着以一种更加积极自觉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由此而来的全球化不再是资本逻辑线性扩张的展开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单向输出,而变成了介入其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开创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实践创造。“正是全球化,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都是居住在一个星球上的,不管属于什么样的种族和拥有什么样的肤色,共生共在才是第一位的。”<sup>[15]</sup>尽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维系的殖民主义、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蠢蠢欲动,但全球化大幕的拉开已经使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赫然在目,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现实的个人”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协同共振旋律的“曲中人”,并最终将伴随着普遍交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深谙全球化生存“曲中意”(开放精神、平等精神和自由精神)的自觉行动者,全球民主的时代已经伴随着共同建构和追求美好生活理念的普及而豁然降临了。可以说,世界历史正在类价值主体的普遍觉醒、自主发展、相互交往和共同建构中迈入更加文明进步的发展阶段。

### 三、文明交流互鉴孕育类价值标准的充盈张力

当今时代,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可以

从在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丰富和拓展的交往哲学理念那里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蕴涵着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生成的共识性类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在全球普遍交往的共同生存语境中唯有一种基于平等承认的视域融合才能生成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充盈张力的类价值标准。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参与者共有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自明性的视域,在其中可以通过视角的转换形成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由此可以构思一种奠基于共有生活世界、趋向视域融合、达成价值共识的交往范式:“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些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并在语法上形成了一种相应的人称代词系统。不管是谁,只要经过这个系统的训练,都能学会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sup>[16]</sup>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这种交往理性生成价值共识的思想对于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交流互鉴和普遍和谐共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交往范式以一种相遇相携的姿态确立了一种理解全球化生存的新世界观,尊重而非蔑视、欣赏而非厌弃、承认而非贬抑、融合而非对立成为世界历史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

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以强势进取自诩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内在的支配理性已经暴露出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表现为‘浮士德精神’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成为进取性十足的强势文明,它孕育并借助资本的全球性殖民和扩张,对非西方世界和大自然都表现出‘征服’和‘控制’的霸道。它在将全人类组织到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和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对立。”<sup>[17]</sup>可以说,

相比于封闭保守的传统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内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支配理性释放了人身上的扩张性冲动和创造性欲望,这尽管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和活力,从而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也为启蒙叙事的世界性拓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启幕奠定了基础),但另一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遮蔽和消解了维系人之为人的审慎和节制,并由此而呈现出巨大的破坏性:人与自然的对立及其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人与人的对立及其产生的严重社会冲突,人与自我的对立及其引发的严重精神虚无,都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社会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无法达成逻辑自洽和自我证成。夹杂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化追求意味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和主体自觉,这为全球化生存语境中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生成类价值标准的充盈张力确立了重要的前提性条件。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指出:“‘命运共同体’植根于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共同性与和谐话语,涵盖人生过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与环境 and 自身之外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交织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未来的生存条件。这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日常哲学。”<sup>[18]</sup>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现实的个人”都介入全球化进程中并越来越形成了一种命运与共的价值自觉。因此,当今时代全球化生存是一种圆融通达的和谐状态,其中蕴涵的类价值标准绝非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元设定,唯有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生成具有充盈张力的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共识。

面对全球化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充分展开的现实,需要在视域融合的哲学世界观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不同的文明样态是差异化(也是一种互补式)地理解、阐释和显现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生存视角。在一种更为源初的存在论意义上,世界不是一个有待于认识、把握和改造的客体,而是人类一切生存性活动和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



前提和根本处境;世界不是诸实体的排列组合,无法被概念化理解,不能被认识和把控,而只能被体验和显现。“世界是如此地无所不包,同时又如此地封闭,以致它不为人所关注。人正是透过世界来观察,但是,若没有它,人就不能在其自身的显现中观察到任何东西。不为人所察觉的、预先设定的、涵摄万象的世界始终是在场的、显而易见的,并避开人们将其作为客体来把握的一切尝试。”<sup>[19]</sup>文明是世界的显现方式,渗透和体现了生活在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现实的个人”的真实而生动的世界观。任何一种具体的文明样态都仅仅是对整全世界的一种呈现视角和诠释进路,都不可能垄断和独占对全世界的解释权。保持向世界敞开状态的文明才是充满无限活力和具有无限发展空间的文明,唯有与其他文明建构起一种平等的视域融合关系的文明才是真正具有进取精神的文明。这里的视域融合意味着处于同一世界的不同文明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建构、相互证成的积极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我—它”关系的基于平等承认的“我—你”关系——由此,世界不再是一个被占有、支配和征服的客体而成了一种涵育希望和未来的生存境遇。视域融合不是自我的消失,而是真正自我的成长;视域融合不是他者的遮蔽,而是他者意义的显现。因此,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过程就是自我文明与他者文明在视域融合中共同成长的过程,就是以一种圆融通达的方式对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积极呈现。

由此可见,基于视域融合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一种积极的双向达成,由此能够塑造彼此承认、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文明要发展,必须要有一种开放包容、充分接纳、取长补短的相互学习意识。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

的。”<sup>[20]</sup>每一种文明都是特定社会生活共同体历经岁月洗礼而沉淀下来的积极的精神性力量,都体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思想传承和文脉延续,都蕴涵着激励奋进、追求卓越的基因和品格。世界文明版图的璀璨和荣光得益于这些不同文明的交相辉映、协奏共鸣。孤芳自赏并非文化的自信自立,妄自尊大只会阻塞文明成长发展的通络进路;同样,盲目附庸并非文化的自谦自持,妄自菲薄只会造成文明共进共荣的失语缺位。世界文明的演化发展史正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进步史,也正是人类在相互学习中不断完善的精神成长史。世界历史的发展绝非仅仅地域束缚和空间局限的打破,也绝非经济依赖和社会交往的加剧,内蕴其中的还有不同文明的激励成长所带来的人类更高层次的类生存自觉和类价值共识。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sup>[21]</sup>尊重文明多样性,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和合共生,才能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才能为全球化生存开启共生共融、共在共进的华彩乐章,才能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和谐共在的生存实践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类价值生成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交往意识深化所蕴涵的类价值主体的精神成长,彰显着文明交流互鉴所孕育的类价值标准的充盈张力,对于引领全球和谐共在的生存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22]</sup>可以说,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生存的重大命题,渗透和展现着人类在沟通、对话中摆脱认知偏见、增进彼此了解、凝聚发展共

识的类价值自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在化解意识形态话语纷争、破除零和博弈思维、团结世界人民协同共进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引领和目标导向作用。

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球化生存的现实,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化生存休戚与共的现实正在考量着人类积极生活的实践智慧,各种潜在机遇的把握和各种隐含挑战的应对都需要一种清醒而明确的类价值自觉。“正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日益彰显人类共同利益,并要求人们学会相互对话、相互尊重,在对话、沟通中协调全球公共政策,实现人类的整体性进步。”<sup>[23]</sup>从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始,这一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高度契合的价值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接受、认同和践行,因为这既传承了千百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更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和高远境界。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错叠加,是对中国崛起所处其中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顺应和推进,蕴涵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及其世界意义的自觉显现。在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背景下,由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关乎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现实的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引领全人类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破除利益对立壁垒、充分把握发展机遇、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是中国自主发展与世界文明进步协调一致、同频共振的重要体现。

全人类共同价值理顺了全球化演进的机制,具有丰富的协商意蕴。导引全球化演进的思想旗帜经历了从19世纪英国的“自由竞争”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人权、民主、自由”再到21世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谐共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竞争”的资本扩张逻辑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实质上都是一元主导、单极世界的霸权理念,反映的是旧全球化阶段“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力量不断崛起,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全球化不均衡、不协调的发展局面,将普遍在场、平等发展、合作共赢、共谋未来的全球协商精神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实现了21世纪全球化生存从西方“普世价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范式转换。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sup>[24]</sup>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事关全球化生存的核心命题的解释权交到了在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延续中生成的具体文明样态手中,并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围绕共同关注、共同利益展开平等的对话交流,以寻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识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一种富有活力、充满弹性的解释框架,每一种文明都可以围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内涵和意义发出声音,都可以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序章中传递最美的音符,由此而导引的全球化生存必将是一幅异彩纷呈、交相辉映、璀璨夺目的壮美画卷。

全人类共同价值廓清了全球化发展的路径,具有明确的实践旨向。当今时代的全球化发展早已告别了你争我夺、暴力征服的“原始丛林”法则,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而肆意扩张权力意志的西方“普世价值”也被剥落了充满迷惑性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如何真正为全人类前途命运负责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逐渐形成了共识、达成了自觉——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这种共识和自觉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sup>[25]</sup>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蕴涵着丰富的全球化实践智慧,那就是在尊重历史传统、立足当前现实、筹划前途命运的动态平衡中将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发展实践与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全球化演进的基本规律紧密结合起来,站在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战略高度上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为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相互交流、学习借鉴的平台。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探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靠机械复制、简单套用抑或复古保守、畏首畏尾都不可能真正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力证明了融入全球化与推进现代化是一个协调融通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是全球化实践智慧的充分彰显。

当今时代,世界历史在迭代升级中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客观趋势不可逆转,人类的全球化生存状态既面临着重大调整的战略机遇,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急需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全球价值话语作为指导和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话语形态,蕴涵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中国自身崛起发展的同时积极贡献世界的重大意义,体现了世界历史深度发展背景下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对于破除西方“普世价值”意识形态迷雾、切实将世界人民的

美好生活追求作为根本关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注释: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541、541页。

[2][7][12][21][24][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4、424-425、475、475、462、425页。

[5][23]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8、95页。

[6][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8]张军:《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

[9][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1-62页。

[10]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1][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469-470页。

[13][德]马克思:《博士论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5页。

[14][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6页。

[15]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1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47-348页。

[17]张曙光:《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53页。

[18][英]马丁·阿尔布劳:《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2-143页。

[19][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4页。

[2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责任编辑:刘 鏊]